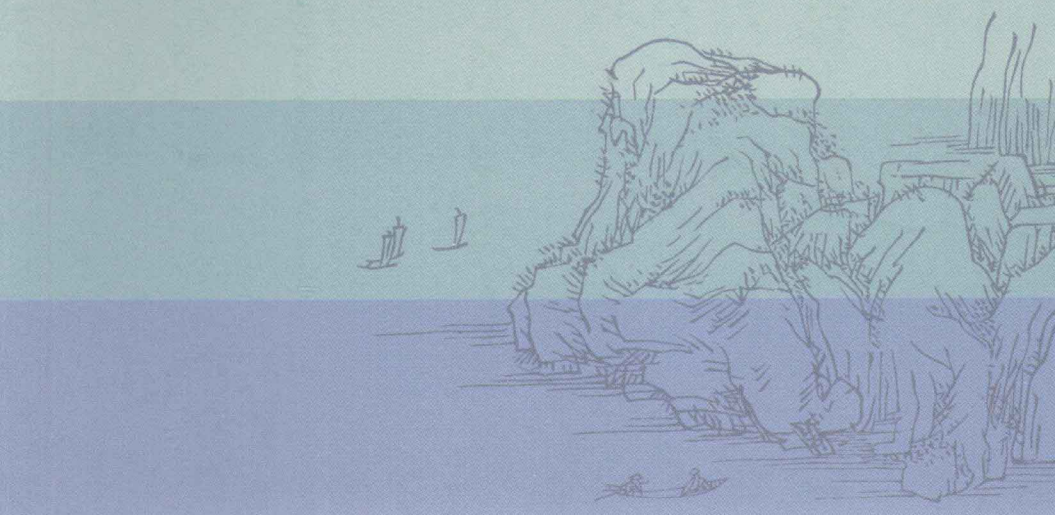




山水与古典

林文月 著





山水与古典

林文月 著



著作财产权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为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01-2013-66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水与古典 / 林文月著.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9

ISBN 978-7-108-04504-1

I. ①山…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1700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625

字 数 184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7.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写于重排版书后

《山水与古典》这本书，最初是在一九七六年由纯文学出版社出书，林海音先生主持其事。她自己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推动纯文学的有心人。纯文学出版社的主要方向，诚如其名，以纯文学作品之出版为主。我个人曾在“纯文学出版社”创办的初期出版过《京都一年》。那是在林先生鼓励下，以游学京都一年的闲居时间，每月撰成一篇与京都相关的散文而结集的书。其后，相隔约五年，海音姐问我：“可有什么书让我们纯文学替你出版呢？”我说：“忙着教书，没有多少时间写文章。”“你那些写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也是文章啊。”她总是有理由推动事情的。遂检视抽屉内各论文的旧抽印本，共得长短十三篇。

这十三篇论文，当初写作时，或与自己研究范围相关而撰述、或因参与各种学术会议而提出，都是与我教学研究生活有密切关系。不过，各篇的撰写，初时并未指向出版一本书为目的，所以其间未必有相互关联。在内容方面，包括论说中国的古典诗与诗人者，有兼及中日比较文学者。这些主题的研究，一直都是我所关心的。只是，在出版之际，要找一个能够

涵盖这样内容的书名却不太容易。还记得当时在海音姐与何凡先生的府上，文人雅士高朋满座，许多人都替我费神构想。几乎是集思广益之下，才定书名为《山水与古典》。到如今都还记得那种大家为我这本书热烈讨论的情形。其实，大部分的人赞成，也有一些人不十分同意。最后，有人说：“名可名，非常名。”

于是，《山水与古典》便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本书的名称。

纯文学出版社结束后，一九九六年承三民书局美意，把我在纯文学出版社的三种书予以排版呈现，《山水与古典》为其中一本。值此辛亥百年之际，将再予重新印制，更是令人欣喜安慰的事情。容我在此补述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小故事以致谢意。

林文月

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新版序言

这本书是二十年前所出版个人的第二本论文集，当时由林海音女士所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编印刊行。关于诸篇的内容以及写作背景，已见于初版的《前记》之中，此不重复。

二十年之间，许多美好的事情发生过，也有许多事情渐生变化，甚至于不得不落幕结束。

这本书中所收集的十余篇长短文章，正是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最忙碌的时期所写。当时除了授课准备教材，以及这些论文的撰著之外，又已经开始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的译注；同时，也逐渐用心研读外祖父连雅堂先生的诗文。从本书中所辑入的《〈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及《连雅堂与王香禅》等文章，可以看出端倪；而在本书出版后，我译竟《源氏物语》，也撰成外祖父的传记《青山青史——连雅堂传》。

《山水与古典》的出版，在我个人的写作生活上，因而成为一个分水岭：一方面我孜孜不懈于自己的本业论文之著述，另一方面又兼及于译事及散文之写作。二十年来，这样的写作方向未尝改变过；遂令我于初版前

言之结束处所言诸语，呈现了矛盾状况。然而，我并没有后悔；不唯不后悔，觉得这样的改变，其实是相当自然且有脉络可循的。写作兴趣之趋于广泛，给予我较大的思考角度和空间，其正面的意义，毋宁是更值得自我安慰的。即以学术论文之撰著而言，其后之所作，似乎往往更能突破框架囿限。就此观之，某些事情的渐生变化，虽难免始料所未及，却也总是有其不得不然的轨迹隐约存乎其间。

而二十年的光阴，在猛然回首之际，则又未免似迢递实匆促，令人惊心感慨。我自己已于三年前自台大退休，纯文学出版社亦于去年结束业务。林海音女士慨然将此书版权归返予我；旋又承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美意，遂有此书重新排版问世之机会。

新版《山水与古典》，仅在若干文字的错误及不妥处有所更正外，余皆保留原来面貌。时光虽不可追回，往昔一字一句的心血，于我校对之际，仿佛又重现眼前。三民书局编辑同仁细心协助完成其事，令我感激，特此致谢。

林文月

一九九六年四月三十日

前 记

这本书里所包含的十三篇文章，是我十年前出版《澄辉集》（《文星丛刊》二五二）以后，陆续写出的一些有关我国古典诗文及文人的短论。内容大体可别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六朝诗为中心课题者，包括游仙、田园、山水、宫体诗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在目次上，从第一篇至第六篇便是。第七篇谈白居易的讽喻诗，虽在时代上是属于唐朝的，但性质内容也可以收入在第一类型之中）；第二类是以文人为主要对象，而兼及于其诗文的（第八篇至第十一篇是）；第三类则兼谈诗与文的关系（末篇并及于中日文学之间的影响比较问题）。

我所以把这十三篇文章放置在一起结集成册，乃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通之点：这些文章的篇幅长短大致接近，而我写作的态度虽然是认真严肃的，笔调却都比较轻松。为求内容之一致，我没有把在《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二十一期里发表的《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那篇比较专门而可能是比较枯燥的论文收入此集内。

从文章的来源说，这十三篇作品之中竟有七篇是先后出自台大外文系

主办的《中外文学》。计有：《从游仙诗到山水诗》（第一卷第九期）、《中国山水诗的特质》（第三卷第八期）、《陶谢诗中孤独感的探析》（第四卷第十一期）、《宫体诗人的写实精神》（第三卷第三期）、《阴阳怪气说郭璞》（第三卷第九期）、《连雅堂与王香禅》（第四卷第二期）及《〈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第一卷第十一期）。在编排目次的时候，这个事实不由得令我略感吃惊，而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的单调个性。

我写作赏析古典的论文始于大学生时代。当时有一份至今使人怀念的《文学杂志》。受了师长学长们的鼓励，我曾在那份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成熟的短文。那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文章多数已收入《澄辉集》之中。其后，《文学杂志》停刊，《纯文学》代之而起。我先后也在那份杂志上写了一些论文。不过，后来由于赴日一年，旅居客乡的寂寞使我有较多的闲暇写游记杂文，所以我在《纯文学》里发表的散文竟超过了论文。每月一篇的游记在一年多之后便集成了我的散文集《京都一年》了。尔后，《纯文学》也停刊。由台大外文系主办而由中文系与外文系支持合作的《中外文学》继起。我又很自然地陆续在这一份刊物上投稿起来。以上七篇文章便是如此诞生的。

《鲍照与谢灵运的山水诗》一文系发表在甫于一年前创办的《文学评论》第二集里。这篇文章该算是属于上述第一类型中唯一非《中外文学》的作品了。

《陶渊明：田园诗和田园诗人》及《略谈白居易的讽喻诗》二文是我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那五年间主编《国语日报》的双周刊《古今文选》时期，于选注古诗文之际，为篇幅补白之需要而撰写的。《古今文选》的读者对象以高初中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为主，故笔调力求简明，且

避免繁琐的典故与注解，所以这两篇文章在本书之中颇有些国画中“留白”的意味吧。

《阿倍仲麻吕（朝衡）事迹考略》则与上二文恰成对比，是一篇偏重考证性的文章。此文本是我六年前在日本所写的论文《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中的一小部分，后应双月刊《思与言》之邀，稍加补充扩张而成。由于文字略嫌枯燥乏味，在编排目次之际，曾经犹豫取舍。后来觉得阿倍仲麻吕以一介日本留学生而终身留居唐朝，且与唐之文士如王维、储光羲、李白等又有过密切的交游，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是透过小事也可以让我们想像昔日中国文化灿烂之一斑，所以还是决定辑入。

《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一文最早发表于《国语日报》的另一份双周刊《书和人》。这篇文章后来屡次被报章杂志乃至学生的刊物转载引用，而文字竟也多少有了些许出入。利用此次收入本书的机会，我曾予互相比较而略有增删改动，所以与原载于《书和人》者小有不同。外祖父去世时，我仅四岁，有些零星片断的记忆却仍依稀存留脑海中。每回我重读纪念他老人家的此文，眼眶总难免要发热湿润的。

《阴阳怪气说郭璞》及《连雅堂与王香禅》这两篇短文是为《中外文学》曾拟设的专栏“中外文人”而写。此专栏原先是预定由中文系的青木（笔名）先生与我，以及二位外文系的先生轮流执笔，用比较轻松而不违史实的态度来介绍古今中外文人生活逸事的。未料，原先讲好《中外文学》隔期推出的这个专栏，在青木先生与我各登二文之后，外文系方面竟未有稿件合作，竟致流产停顿了。此二文当时发表时，我用的是笔名，所以对于我的外祖父也很不恭敬地直呼其名。不过，我写这篇六千余字的短文所下的工夫却不比《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少。外祖父与王香禅女士间的故事，许多年老一辈的人都乐于谈论。身为雅堂先生外孙女的我，对他老人

家自是十分敬重的，但是对于诗人连雅堂先生，我对此亦难免有一份好奇心。然而此类文人私生活方面的资料，在传记（我的舅父连震东先生在《台湾通史》书后附录有《连雅堂先生家传》及《连雅堂先生年表》）及年谱（《台湾风物丛书》有郑喜夫先生所编《连雅堂先生年谱》）里都看不到什么痕迹。我曾经央求家母告知一二，可是她总支吾其辞未肯详述。去年暑假里，我乃鼓起勇气径赴士林，向舅父提出种种问题。很感谢舅父是一位开明而坦诚的人，在两小时的谈话里，我从他的记忆之中寻找到一些事实真相。犹记得那个黄昏，舅母也时时在一旁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佐证，我把两位长辈的可贵谈话内容牢记于心中，回家后再与外祖父的诗文参照比较，便写成了这篇文章。我自信写此文的态度是相当客观而严肃的。外祖父生前，在孙辈中最疼爱我，谅他老人家地下若有知，亦当原谅我这饶舌的外孙女吧。

《〈长恨歌〉对〈长恨歌传〉的影响》原载于《现代文学》第四十四期。题目本作《〈长恨歌〉对〈长恨歌传〉与〈源氏物语·桐壶〉的影响》，篇幅也当然较本书所收者为长。我写此文时尚未着手翻译《源氏物语》，对《长恨歌》给予《长恨歌传》及《桐壶》的影响，也只做到等量的对待处理而已。可是后来赴日参加日本笔会主办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时，曾提出一篇日文书成的论文《桐壶と长恨歌》。此文对《长恨歌》与《源氏物语》的首帖《桐壶》，有较详实的比较讨论。返台湾后，我把那篇文章还原为中文，同时为着读者的方便而试译了《桐壶》为中文，一并刊登于《中外文学》。因此，我这里便将《现代文学》所载的后文约三分之一部分删除，而另收入此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并将当时刊载的译文也同时附录于文后，俾便于本书读者诸君之阅读比较。

在此，我想附带提一笔。自从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为了发表《〈源氏

物语·桐壺〉与〈长恨歌〉》的实际需要而试译《桐壺》一文之后，《中外文学》的编辑与读者们再三鼓励我将《源氏物语》全书继续翻译下去。那五十四帖百余万言的日本古典巨著的全译工作岂是渺小如我者所能负担得了的？但人生真也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原本是我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艰难工作，如今竟然落在我肩上，成为我平日授课与家务之余的最大重担，而每月平均万余字的翻译，也就成为近年来我日夜最挂虑的事情了。现在我已译成三分之二，距离完工之日虽然尚有一段时间，但希望总在前了。待那时候，还我自由之身，我冀求能完全回到自己的本行来，更努力研读我所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

林文月

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

目 录

写于重排版书后 001

新版序言 003

前记 005

从游仙诗到山水诗 001

中国山水诗的特质 019

陶谢诗中孤独感的探析 047

鲍照与谢灵运的山水诗 071

宫体诗人的写实精神 095

陶渊明：田园诗和田园诗人 115

略谈白居易的讽喻诗 123

阿倍仲麻吕（朝衡）事迹考略 129

阴阳怪气说郭璞 141

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 151

连雅堂与王香禅 169

《长恨歌》对《长恨歌传》的影响 187

《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 199

附录：《桐壶》（《源氏物语》首帖） 213

从游仙诗到山水诗

一、前 言

五世纪时代，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以自然景物为题材的山水诗，以其新鲜的色彩感与形象感，拓广了诗的写作范围，不仅使六朝的诗坛活跃了起来，且更予唐诗莫大的影响。促使文学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元性的，就以山水诗产生的原因而论，除了刘勰归因于“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1〕以外，他如历史社会的背景、生活风尚、思想潮流、作家个人的嗜好等因素，也无不直接间接有所影响；而就文学本身观之，则辞赋、招隐诗、行旅之诗等文学的内容形式，也不能不说与山水诗各有其远近的渊源关系。不过，这些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此文拟仅就山水诗产生的途径之一——从游仙诗到山水诗，透过郭璞、谢灵运等主要作家的诗，实际观察

〔1〕 详《文心雕龙·明诗篇》。

分析，从而把握其酝酿、发展，乃至成熟之过程。

二、郭璞以前的游仙诗

我国历史上，从汉末的离乱，经三国之鼎立，再入于两晋之世，在此绵延二百余年的时间里，内有黄巾之乱，八王攻伐，外有五胡十六国之侵扰，实在是一段空前紊乱黑暗的时代。生活在那样的乱世里，人们失去了生活的安全感，甚至于对生命的保障也没有了信心。在兵荒马乱中无辜而惨死的百姓自是不计其数，而文士们因政治党派的倾轧而横遭斧钺者，亦多至令人心寒。仅就魏晋之际随便举例，便有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廙、何晏、嵇康、张华、陆机、陆云、石崇、潘岳、刘琨、郭璞等。在这个时期里，人对生活的要求已退至仅求保身而已。于是无为逍遥、逃避现实的老庄思想乃应运而复活，吸引了当时的人心，给他们开拓了一条新出路，缓和了现实生活的紧张。儒家思想中固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之说；而老庄的宗旨是为清静，归真返璞，要人回到原始的自然，而与世无争。既然眼看着政治社会已到了不可兼善的地步，于是知识阶级便纷纷趋于独善之途，竟以山林自然作为保命托身之所了。竹林文士之悠游逍遥，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如左思、郭璞、孙绰之辈，虽未有明显的栖隐之迹，而在他们的诗文里却也时见对老庄思想的醉心，与对山林自然的向往。可以说，魏晋之际，崇尚老庄、徜徉山林，几乎已成为当时文士们的一种风尚了。

由于文人的思想已不再囿于儒家入世的功用主义，而普遍倾向于道家

〔2〕 见《孟子·尽心篇》。

出世的浪漫主义，故在诗坛上也就呈现了一片活泼的自由抒写的景象。同时因为老庄思想既已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于是“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篇》语）遂成当然的道理。所谓“仙心”，乃是指描写“滓秽尘网，锱铢纓纓，沧霞倒景，饵玉玄都”〔3〕一类境界者，亦即老庄所歌颂之虚无出世境界的具体发扬。这一类的诗，便是游仙诗。写这种非人间的诗章较早者当推曹植。虽然在他的父亲曹操的诗篇中也有《气出唱》三首、《陌上桑》、《秋胡行》二首诸篇，甚至更早的还有屈原的诸作，然而都只是对人生偶发的感慨，或愤世嫉俗之词，未若曹植各篇的认真。同时，曹植的诗在其题目上也已有颇明显的表示，如《升天行》、《仙人篇》、《灵芝篇》等，皆饶富仙味了。试看其《仙人篇》：

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
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
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驱。回驾观紫薇，与帝合灵符。
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余。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
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俯观五岳闲，人生如寄居。
潜光养羽翼，进趋且徐徐。不见轩辕氏，乘龙出鼎湖。
徘徊九天上，与尔长相须。

这里面所描写的是虚幻的仙境。当作者假想自己与仙人为伍，遨游逍遥时，其精神已超越了现实世界，忘却烦恼，获致暂时的解脱与慰藉了。

〔3〕 见《昭明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

有时作者更假托想像中的仙人，以达到自我劝勉的目的，如《苦思行》。

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晖。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

此等仙言道语固然与曹植个人际遇有关，亦何尝不是与他同时或稍后的文士们借以逃避现实、发泄苦闷的一种方法呢？七贤之中，嵇康与阮籍也都做斯言斯语。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
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
飘飘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援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
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
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嵇康《游仙诗》)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
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瘞横木隅。
欢笑不终宴，俯仰复欷歔。鉴兹二三者，愤懣从此舒。
(阮籍《咏怀》)

其中尤以嵇康之诗已明言“黄老”、“采药”等词，而题目也清清楚楚地写着《游仙诗》了。这种情形较诸曹植那种借仙境之幻游以自娱，显示着有